

人称指示语语用移情和离情策略研究

——以《红字》及其译本为例

柴照欣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沈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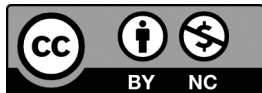
摘要 | 人称指示语作为语言学中的重点研究对象之一，表达了说话人与言语事件中各种语境参数之间的联系，是人们交际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本文基于语用移情和离情视角，通过对《红字》中人称指示语的分析，探究人称指示语在特定选择下所产生的不同语用效果。研究发现，人称指示语的选择与巧妙变换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说话者达到移情与离情效果，从而实现其不同语境条件下的语用目的。对人称指示语的研究凸显了文学作品语言运用方面的艺术内涵，也为人们了解在现实语境中如何更合理地运用人称指示语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 | 人称指示语；语用移情；语用离情；《红字》；语用效果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人称指示语通常指谈话双方用话语来传达信息时的相互称呼（何自然，1988），它与地点指示语，时间指示语等密切相关，在各指示语中占主体与核心地位。通过指示语，话语和语境之间的关系才明显地在语言结构上表现出来（Levinson, 1983）。菲尔墨（Fillmore, 1977）、莱文森（Levinson, 1983）、尤尔（Yule, 2000）和何兆熊（2000）在它们各自的专著中都就人称指示语的定义和基本用法进行了论述；何自然和冉永平（2006）指出人称指示语是会话中用来表示参与者角色的词语，主要通过人称代词来实现；在实际使

用中，人称指示语常由于说话人在特定语境下的不同语用目的，偏离其基本用法，导致非常规用法的出现。而“移情”是人称指示语非常规选择所产生的最基本的语用效果（杜小红，2003）。

“离情”是中国语言学家冉永平基于移情提出的语用学领域的另一重要概念，指交际对象间的情感和心理趋异，表现为说话人情感或心理上对听话人或第三方的排他性，甚至对立性（冉永平，2007）。

随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翻译研究在很多方面受到女性主义思想的滋养（Simon and Flotow, 1997）。美国著名作家霍桑的代表作《红

字》讲述了发生在北美殖民时期的爱情悲剧，女主人公海丝特挣脱清教思想的枷锁，勇敢保护所爱之人，历经重重磨难，最终以勤劳、坚毅和善良赢得了社会的尊重。此外，文中对其他主要人物，如牧师丁梅斯代尔、海斯特的丈夫奇凌渥斯及女儿珠儿等人物形象的刻画亦是鞭辟入里。

《红字》中的对话片断虽不多，但句句典型，基本涵盖了人称指示语不同用法的形式，包含常规用法和非常规用法，而且体现了人称指示语所凸现的语用内涵，彰显了霍桑对人称指示语用法的娴熟把握。在实际语言运用中，由于语境和对话双方情感状态的变化，人称指示语通常可以突破特定的“数”和“人称”的规定性发生变异，由此产生了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闫俊宇、杜小红，2008）。

目前学界主要关注人称指示语的语用移情策略，但对语用离情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少，对于《红字》文本的研究也仅仅停留在语用移情的研究上，将人称指示语、移情、离情三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研究更为少见。

因此，本文从移情和离情的心理情感角度出发，基于《红字》中人物的对话，主要探讨三个问题：（1）在不同的语境和情感状态下，《红字》中人物是如何对人称指示语进行特定选择与巧妙变换的？（2）通过这些人称指示语的变换产生了怎样的语用效果？（3）这些效果的实现会受到翻译限制的影响吗？

二、文献综述

（一）指示语

指示语的研究是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球范围内学者们对指示语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布勒（Buhler，1934）发起，他将指示语分为人称指示语、时间指示语和空间指示语。

第二阶段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由菲尔墨（Fillmore，1971）和莱昂斯（Lyons，1977）发展。那时，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和空间指示被加入到了话语和社交指示语中。莱昂斯在1977年出版的《语义学》一书中指出：“目前，语言学中使用指

示语这个术语是为了指代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的功能、时态以及与话语的时空坐标相关的其他语法和词汇特征的功能，这些特征将话语与话语行为的时空坐标联系起来……指示语的语法化和词汇化可理解为与话语的规范情境相关的：这涉及以声音媒介沿着声音听觉通道进行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信号传递，伴随着其话语的相关非语音语言特征，每个特征依次承担发送者和接收者的角色。”（1977：636-637）。莱昂斯是第一个提到指示性投射现象的人。

第三阶段是在莱文森（Levinson，1983）出版《语用学》一书后，他认为指示语主要“涉及语言如何对话语或言语事件的语境进行编码或语法化，因此也涉及话语解释如何依赖于对话语语境的分析”。

根据上述定义，尽管学者们尚未就指示语达成完整一致的定义，但可以得出的是，指示语指的是与指向和指示相关的指示表达，并与话语的语境密切相关。

（二）人称指示语

在前面的部分中，已经阐述了指示语的定义、分类和发展阶段。其中，本文研究重点为人称指示语。

大量学者在语言学的各个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称指示语展开研究，如心理语言学、语义学和语用学。其中，语用学领域的研究最为普遍。Levinson（1981）首次阐述了这一概念及其分类，后来的学者大多采纳了他的观点。根据他的观点，人称代词涉及对话语事件中参与者的角色进行编码。一般来说，第一人称是指说话人对自己的编码；第二人称是指说话人对听话人的编码；而第三人称则是对所讨论的人和某些实体的指称的语法化，既非说话人，也非听话人。

在中国，自1898年马建忠先生写下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以来，人称指示语就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何自然（2003）指出，人称指示语是一个必然涉及与识别参与者角色相关的不同类型信息的语言单位，主要通过人称代词实现。第一人称指示语，包括说话人，像I（We）；第二人称指示语，包括听话人，像You（You）；第三人称指示语，既不包括说话

人,也不包括听话人,像he, she, it (they),也可以是名词或名词短语(王钢,1987)。例如,一个人说:“他是老师。”或“这是什么?”在这些句子中,“他”和“这”都是指示表达,用于指示一个人或一个物体。综合来看,人称指示语作为一种指示说话人、听话人和第三人的符号指称,主要包括传统的人称代词、亲属关系术语、头衔、称谓语以及其他名词词组或短语等(黄衍,2007),能够反映说话人对言语事件中其他参与者的感情、态度及相互关系。

(三) 语用移情

“移情”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美学研究领域,后来由心理学家立普斯(1980)引入人际交往领域。移情意味着“我”与“对象”间的对立消失,即“自己”与谈话“对象”融为一体,他指出共情是“一种感受到人们情感中表现出来的运动或动态姿势的过程,这些情感可以是人们、美学对象或自然景观中的”(Ossowski, 1978: 160)。蒂钦纳从情感的角度定义了共情。他称移情为“使事物人性化,读取或感受事物的过程”(Titchener, 1924);《大英百科全书》(1999)将其定义为“设身处地想象自己置身于他人的位置,并理解对方的感受、欲望、思想和行动的能力”。

科勒(Kohler, 1932)首次从认知的视角描述了移情。他认为移情是一种理解他人感受而不是分享它们的能力。大约同一时间,米德(Mead, 1934)认识到移情中的自我与他人区分。然后,他为移情添加了一个认知组成部分,即理解的能力。布朗(Brown, 1987)在《语言学习和教学原理》一书中,将移情定义为“将自己置身于他人的角度,超越自我,理解并感受另一个人的理解或感受的过程。这可能是个体在社会中和谐共存的主要因素之一。语言是移情的主要手段之一”。科恩和斯特雷(Cohen and Strayer, 1996: 988)指出,移情是“理解并分享他人的情感状态或背景的能力”,既是认知过程(例如,理解他人的情感状态),也是情感能力(例如,分享另一个人的情感状态)。霍根(Hogan, 1969)将共情定义为“理解或想象另一个人的状态或思维状态的智力或想象能力”。另外,弗舍伦(Verschueren, 1999)在他的语言适应理论中将

共情定义为语言选择的结果。

何自然(1991)是国内首位对语言学中的移情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是首位提出语用移情概念的学者。在1991年,他发表了一篇名为“语言交际中的语用共情”的文章。根据他的说法,“在语用学中,移情意味着参与交际行为的说话者和听话者能够察觉和识别彼此的即时情感状态,通过设身处地地融入对方的角度对消息进行编码和解码”。

(四) 语用离情

与移情概念相反,离情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尚未被广泛研究。冉永平(2007)最早在移情基础上区分出“离情”,主要表现的是交际双方之间心里情感的一种趋异。如果说话者有意拉长双方之间的心理距离,表现为使用使对话变得更加艰难的人称指示词,以表明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冷淡的,或表达不想与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事实,或显示对他人的仇恨、不满、对立或其他类似的情绪。显然,这是一种分歧,或者说是去同理心的实现。

三、人称指示语的语用移情和离情在《红字》中的体现

人称指示语与人称代词最大的区别在于其与语境发生关系,只有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被充分理解。为了在交际语境中实现顺应,说话人必须建立一定的人际关系,或亲密关系,或疏远关系。在交际中,讲话者通过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和词语来表达不同的感情或意图,其中,多选择非常规的人称指示语。下面就结合《红字》及其译本中的人物对话来分析各类人称指示语所体现的语用移情和语用离情功能。其译本出版于2016年,译者为刘莉、张森。《红字》中对话片断虽不多,但句句典型,基本涵盖了人称指示语不同用法的形式,而且体现了人称指示语所凸现的语用内涵,彰显了霍桑对人称指示语用法与人物细节刻画的运筹帷幄。

(一) 语用移情策略

王初明(1990)认为移情的产生需具备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意识到或了解自己的感受;二是将自己与别人等同起来。这就是说,不论是善意或是存在恶意的移情,说话者都是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娴熟地驾驭和组织语言的。

1. 第一人称指示语复数指代说话人

例（1）

原文	译文
“Goodwives,” said a hard-featured dame of fifty, “I’ll tell ye a piece of my mind. It would be greatly for the public behoof, if we women, being of mature age and church-members in good repute, should have the handling of such malefactresses as this Hester Prynne.”	“婆娘们，”一个满脸横肉的五十岁的老婆子说，“我跟你们说说我的想法。要是 我们 这些上了一把年纪、名声又好的教会会友，能够处置海斯特·白蓝那种坏女人，倒是给大伙办了件好事。”

这里说话人选择使用包括听话人在内的第一人称指示语复数，例如“我们/我们的”（we, our, us）来实现其移情的语用目的。该语境是在海斯特即将要公开受刑前，一个冷酷刻薄的老婆子对其他妇女们的话语，她本来是陈述自身观点，但是原文中却使用了“we”而非“I”，译者在翻译时也依旧遵照原著，译为第一人称复数“我们”，表明老婆子为了煽动听话者在情感和心理上与其取得一致，从而拉近她与其他同伴的心理距离，借助“我们”，以众人观点的名义，达到了她预期煽动大家唾弃海斯特“罪行”的移情效果。在阅读译文时，读者不会受到翻译的限制，同样可以解读出其移情效果。

例（2）

原文	译文
“It were well,” muttered the most iron visaged of the old dames, “if we stripped Madam Hester’s rich gown off her dainty shoulders; and as for the red letter, which she hath stitched so curiously, I’ll bestow a rag of mine own rheumatic flannel, to make a fitter one!”	“我看啊！”一个面孔板得最紧的老太婆咕噜着，“要是 我们 能把海斯特太太那件讲究的衣袍从她秀气的肩膀上扒下来，倒挺不错；至于她绣得稀奇古怪的那个红字嘛，我倒愿意赏给她一块我害风湿病用过的法兰绒破布片，做出来才更合适呢？”

这是在监狱前一个老婆子嘲讽道：海斯特犯了“通奸之罪”，是不值得同情的，应该受到大家的唾弃。说话人此处想用自己害风湿病用过的法兰绒破布片为海丝特做个红字，但在说话时没有使用第一人称单数“要是我……”而是选择第一人称复数“we”替代“I”，译文也遵循原文译作“要是我们能把海斯特太太那件讲究的衣袍从她秀气的肩膀上扒下来……”，运用语用移情策略，将个人想法以集体的形式表达出来，嘲笑海丝特，表明自己对罪恶的深恶痛绝，进而向听众展示自我的“美

德”和“慷慨”，从主体地位向大众方向下移，以博得听者对其观点的认同，进而达到其预期的移情目的。

例（3）

原文	译文
“This is already the better life! Why did we not find it sooner?” “Let us not look back,” answered Hester Prynne. “the past is gone! Wherefore should we linger upon it now?”	“如今我这条生命已经好得多了！ 我们 怎么没有早点想到这一步呢？” “ 咱们 不要回头看了”，海斯特回答说。“过去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 我们 又何必去留恋呢？”

这里说话人丁梅斯代尔和听话人海斯特二人在森林里会面，在当时的情境下，海斯特劝说他逃离此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生活。由此，说话人使用第一人称指示语复数是为了表明当下双方的立场和命运是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离开代表着新生，从而实现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意见，两者可以达成一致的语用移情效果。

2. 第三人称指示语指代听话人

例（4）

原文	译文
“Why should not the guilty sooner avail themselves of this unutterable solace?”	“有负罪感的人为什么不尽早地让 自己 获得这种难言的慰藉呢？”
“Yet some men bury their secrets thus,” observed the calm physician.	“然而， 有些人 就是这样埋葬着自己的秘密的，”那安详的医生评论着。

这里说话人奇凌渥斯选择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原文分别使用第三人称指示语“themselves”“some men”来指代听话人丁梅斯代尔，没有明确指出所说之人就是对方，在当时的语境下，这种用法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尴尬气氛，缓解了剑拔弩张之势，也暗示牧师应当及时承认并忏悔罪行，获得慰藉。译者同样也采取直译的方式，将人称指示语译作“他们自己”“有些人”，以传递人物对话产生的移情效果。

3. 名词短语指代听话人

例（5）

原文	译文
“Why should not the guilty sooner avail themselves of this unutterable solace?”	“ 有负罪感的人 为什么不尽早地让 自己 获得这种难言的慰藉呢？”

这里说话人奇凌渥斯用名词短语 “the guilty” 指代听话人丁梅斯代尔牧师，其语用目的显然是给牧师施加心理压力，暗示他尽快说出真相以求得心灵的慰藉，从而达到自己复仇的目的。这种非常规用法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正面交锋的紧张气氛。同样，读者通过译文“有负罪感的人”也可以体会出说话人的言外之意。

例（6）

原文	译文
“I have striven with my young brother here, under whose preaching of the word you have been privileged to sit.”	“我已经同 我这位年轻的兄弟 争论过，而你正是有幸坐听他布道的。”

此处牧师作为说话人，以名词短语指代听话人，这种非常规用法符合语用移情策略，有利于拉近说话人和听话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其语用目的是达到情感相通，增加亲密程度，从而使说话人的观点态度被听话人接受，两者保持同一立场。

（二）语用离情策略

与语用移情达成的效果相反，语用离情体现了说话人对指称对象的排他性，也是顺应人际交往的需要。多数情况体现在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上。

1. 使用贬损侮辱性词

例（7）

原文	译文
“She hath good skill at her needle, that’s certain,” remarked one of her female spectators; “but did ever a woman, before this brazen hussy , contrive such a way of showing it!”	“她倒做得一手好针线，这是不用说的，”一个旁观的女人说，“这个厚脸皮的 淫妇 居然想到用这一手来显示自己。”

原文中旁观者用 “hussy” 指称海斯特，拉大其与海斯特间的情感距离，实现了离情的语用效果；译者将其译作“贱妇，荡妇”，也体现了旁观者对海斯特的蔑视与鄙夷，力图与海斯特划清界限。

例（8）

原文	译文
“Thou hast kept the secret of thy paramour . Keep, likewise, mine! There are none in this land that know me. Breathe not, to any human soul, that thou didst ever call me husband!”	“你始终不肖泄露你的 奸夫 。那就也为我保密吧！这地方没人认识我。绝对不要对任何人露一点口风，说我曾经是你的丈夫！”

这是海斯特的丈夫罗杰·奇凌渥斯同她的对话，译文里面用“奸夫”来指称丁梅斯代尔牧师，以此来拉开双方的心理距离，与他划清身份上的界限，显示了奇凌渥斯对牧师和海斯特的仇恨，实现了语用离情的效果。

2. 第一人称指示语复数用于不包括谈话双方例（9）

原文	译文
“ We will judge warily,” said Bellingham, “and look well what we are about to do.”	“ 我们会 做出慎重的判断的，”贝灵汉说，“而且也会认真考虑我们即将采取的措施。”

这里的 “we” 指不包括听话人海斯特在内的说话人贝灵汉州长和其他当权者们。结合情境，贝灵汉州长应当是使用了离情策略，其话语表明：贝灵汉为首的权贵们才有权决定珠儿的监护权，海斯特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她是有罪之人，以此达到将海斯特隔绝在外的语用离情效果。因此，不包括听话人的第一人称复数的使用是为了把听话人排除在他们所界定的范围之外，与听话人拉开一定的距离，从而表明自己一方的观点。

3. 第三人称指示语指代第一、二人称说话人

说话人用第三人称代词指代自己，是由于种种原因想与那个自我分割开来，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对自己的看法。

例（10）

原文	译文
“Wilt thou come across the brook, and thy mother , now that she has her shame upon her— now that she is sad?”	“现在 你妈妈 又戴上了她的耻辱，—— 她又 悲伤了，你愿意走过河来，认 她 了吧？”

海斯特把胸前的红字扔掉了，希望彻底摆脱过去，迎接新生，但是珠儿拒绝回到母亲身边。海斯特不得不重新戴上耻辱的红字。海斯特使用 “she/her” 借代第一人称说话人 “I /my”，译文按照原文直译，传递出说话人海斯特意图拉远现在的自己与从前的自己的情感距离，渴望自己能与那个佩戴红字的女人割裂开来，从而远离耻辱。

例（11）

原文	译文
“But, now, I would ask of my well-skilled physician, whether, in good sooth, he deems me to have profited by his kindly care of this weak frame of mine?”	“不过，目前嘛，我倒要向我的技艺高超的医生讨教一下， 他 对我的羸弱的体格的好心关照，是否当真叫我获益了呢？”

这里说话人丁梅斯代尔用第三人称指示语 “he / his” 来指代听话人奇凌渥斯而非直接使用第二人称 “you / your”，目的是表明当下他对医生行为的不满，从而拉开二者距离，暗含讽刺的寓意。

例（12）

原文	译文
“Or— can we not suppose it?— guilty as they may be, retaining, nevertheless, a zeal for God’s glory and man’s welfare, they shrink from displaying themselves black and filthy in the view of men.”	“或者——我们能不能这样假设呢？—— 他们 尽管有着负罪感，然而却保持着对上帝的荣光和人类的福祉的热情， 他们 畏畏缩缩，不肯把 自己的 阴暗和污秽展现在人们眼前。”

在丁梅斯代尔牧师与奇凌渥斯的对话中，奇凌渥斯企图诱导牧师在公众面前袒露真相，但是牧师在回应中一直使用第三人称指示语复数 “they” 指称自身，将自己与罪恶划清界限，表现出面对罪恶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却迫于教义选择逃避的懦弱性格。译者在翻译时能够恰当理解原作者的离情策略，从而采取合适译法，更好地向目标语读者传递正确的信息。

（三）移情和离情策略与翻译的关系

古今中外众多翻译工作者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证明，译者与作者思想的移情是翻译成功的重要前提（杨平、谭春林，2007）。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发现，移情和离情策略的使用不受到翻译限制的影响，本研究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一则 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多数情况下会从翻译忠实性、译者主体性、文化接受的阶段性等多个方面考虑（许均，2023）。移情作为一种克服语言文化差异所造成的距离和障碍的应对策略，其作用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中（谭业升，2009），从而使移情和离情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传递，尽可能超越翻译限制的影响。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对文学作品的再创造，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充分发挥形象思维的作用，翻译过程中的移情作用也同样不可忽视（张文龙，2022）。二则 为语用对等在翻译过程中的影响。正如Leo Hickey（1998：219）认为，翻译实践就是在译入语与源语之间寻求语用对等的活动过程，以此促使译入语读者对源语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感受与源语读者等同。本研究选择的译本不仅遵循了翻译的忠实性原则，尽可能全面传递源文本的真实意图，也

做到了以读者为中心，遵循语用对等，在翻译过程中合理运用移情和离情策略，因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突破文化差异和翻译的限制，感受到原作者在人物对话中使用移情和离情策略所产生的语用效果。

由于离情策略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其在国内翻译文本中的应用较少。部分翻译作品中，人名的使用和翻译可以拉大交际双方的心理空间，达到一种语用离情的效果（冉永平，2013）。本研究结合文学作品的翻译文本，对人物对话中人称指示语不同用法所产生的离情效果展开阐述，研究发现说话人通常使用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用法，如普通名词短语、不定代词或贬损词替换人称代词，从而达到拉大与听话人或所指对象间的情感或心理距离，表达不满、对立、疏远情绪。

杨必的《名利场》译本被认为是原文的“转世投胎”，原文的思想、感情、神韵都融入在译文里，成功实现了移情并传递给了中国的读者，使得读者能够感受到原作者的讽刺讥嘲和幽默的文笔，这一点与本研究的发现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小说《女儿楼》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正是采取将情感注意力取向做移情化处理的方法，实现了小说对读者的移情吸引力（陈吉荣，2022）。这表明，通过译者的深入理解和情感投入，文学作品中的移情和离情可以跨越语言障碍，被有效地传达给目标语言的读者。

四、结语

本文以《红字》及其汉译本中的对话为语料，以语用移情和语用离情为理论框架，结合具体语境，分析了书中人物为表达不同情感，实现不同的人际语用目的，在选择人称指示语时采用的不同的策略。为打动和感召听话人，进而产生强烈的思想共鸣，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说话人常在会话交谈中用第一人称复数“我们”代替第一人称单数、第三人称单数或普通名词；而说话人为展现自己的鄙夷与不满，表达情感趋异或身份差距，扩大与听话人间的心理距离，常使用普通名词短语、不定代词或贬损词替换人称代词进行指称。

语境是会话含义产生之处。要研究人称指示语非常规选择所凸现的语用含义，不能离开其所依附

的语境。在不同的语境中,由于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特殊的关系,会对人称指示语进行不同的选择,因而产生复杂的语用效果。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根据不同的语境认真分析其所传达的弦外之音,使得译文既忠实于原文的精神实质,又能够适应目标语言的文化和读者的阅读习惯。

参考文献

- [1] Bühler K. Sprachtheorie [M]. Fischer: Jena, 1934.
- [2] Bühler K. The Deictic Field of Language and Deictic Words [M] // R. J. Javella & W. Klein. (ed.). Speech, Place and Action. New York, 1982.
- [3] Cohen D, Strayer J. Empathy in conduct-disordered and comparison youth [J].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6 (6): 988.
- [4] Fillmore C. Santa Cruz Lectures on Deixis [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Linguistic Club, 1971.
- [5] Hawthorne, Nathaniel. The Scarlet Letter [M].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6] Hickey L. The Pragmatics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8.
- [7] Hogan T. Development of an Empathy Scale [J].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1969 (33): 307-316.
- [8] Huang Y. Pragmatic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9.
- [9]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and social deixis: Reclaiming the notion of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C] //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79: 206-223.
- [10]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1] Lyons J.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2] Lyons J. Linguistic Semantics: An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13] Mead G H. Mind, self, and societ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 [14] Ossowski S. Aesthetic Value and the Expressing of Psychic States [M]. The Foundations of Aesthetics. Dordrecht: Springer Netherlands, 1978: 206-219.
- [15] Simon S, Von Flotow L.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J].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1997 (1): 149.
- [16]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 1999.
- [17] Yule G. Pragmatics [M]. Oxford University, 1996.
- [18] 陈吉荣. 情感叙事学视域下翻译的情感化处理及其评价——以女性文学作品《女儿楼》英译为例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 (3): 94.
- [19] 杜小红. 人称指示语的非常规选择及其语用探析 [J]. 山东外语教学, 2003 (2): 25-28.
- [20]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21] 何自然. 言语交际中的语用移情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1 (4): 11-15.
- [22] 何自然. 语用学讲稿 [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23] 立普斯. 论移情作用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 [24] 冉永平. 指示语选择的语用视点、语用移情与离情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 (9): 331-337.
- [25] 冉永平. 多元语境下英语研究的语用关注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3 (5): 669-680.
- [26] 谭业升. 论翻译中的语言移情 [J]. 外语学刊, 2009 (5): 137-142.
- [27] 王初明. 应用心理语言学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0.
- [28] 王钢. 普通语言学基础 [M]. 长沙: 湖南

- 教育出版社, 1988: 166.
- [29] 许钧. 实践介入、价值坚守与理论探索——《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评析[J]. 中国翻译, 2023(6): 93-99.
- [30] 闫俊宇, 杜小红. 《红字》中人称指示语非常规用法的语用分析[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41(6): 157-158.
- [31] 杨平, 谭春林. 论译者的移情——以郭沫若的翻译和创作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7(6): 1-7.
- [32] 张文龙. 跨文化视角下的高校文学翻译教学探索——评《文学翻译多维研究》[J]. 中国高校科技, 2022(7): 108.

A Study of Pragmatic Empathy and De-empathy Realized by Person Deixis in *The Scarlet Letter*

Chai Zhaoxi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Abstract: Personal deixis, as one of the focal points in linguistics, express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diverse contextual parameters in speech events. It is an indispensable element in people's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pragmatic empathy and de-empathy,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pragmatic effects of personal deixis in specific choices through an incisive analysis of personal deixis within "The Scarlet Letter". The study reveals that the selection and skillful transformation of personal deixis largely assist the speakers in achieving effects of empathy and de-empathy, thereby fulfilling their pragmatic purposes in different contextual conditions. The research on personal deixis not only highlights the artistic implications of language use in literary works but also provides insights into how to judiciously apply personal deixis in real-world contexts.

Key words: Person deixis; Empathy; De-empathy; *The Scarlet Letter*; Pragmatic effect